

吳元黎編：《中國手冊》

373

竟是一套思想，究竟《法華經》所開啓的佛的知見是一個怎樣的意義？佛的胸懷是一個怎樣的境界？後代註家如何體會？徒然停留於資料是不足夠的。近代日本學者對資料的處理有很高的能力，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但我們不能老是陷沒在這一階段裏。不過這樣說下去就長了。這篇書評到此暫且結束吧。

（按：本書原尚有第三、第四兩組論文，但內容方面多涉及中國以外的資料，本文篇幅所限，茲暫從畧。）

霍韜晦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China: A Handbook. By Yuan-li Wu.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915 pp., Maps, Tables. US\$ 35.00.)

這本厚達九百頁的通書，據編者吳元黎教授說，原為「普通讀者」所編寫，不過，與同類的參考書不同，除名家多人執筆的三十篇專文而外，這本手冊還輯錄了若干關乎中共及其政權興衰離合的文件，和反映中國大陸各個方面現實的研究資料，對較有深度或有意於作深入瞭解的讀者說，其第二、第三部分的價值，或許更高，雖然，這裏所刊載的並非無所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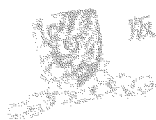
或許由於編者是資源與經濟方面的專家，在三十篇專文中，至少有十篇是屬於這一範疇，以謝覺民的《自然地理》(Chiao Min Hsieh, "Physical Geography")為首，接着是：John Lossing Buck的《土地與農業資源》(Land and Agricultural Resources)；K. P. 王的《自然資源及其利用》(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ir Utilization)。此外，有長期與劉大中教授名字連在一起的葉恭嘉的《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和《農業政策與表現》(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有關人口的兩篇專文《官方的人口資料》和《人口問題、理論與政策》，均由艾約翰(John S. Aird)執筆。對於工業化、銀行與財政、對外經濟關係等問題，亦各有長文介紹。遺憾的是，重工業的發展並無專文討論，好在第三部分列有直到一九七〇年止的重要資料，如鋼鐵產量、煤炭的生產與消費，以及原油的出產數量等，足以彌補此一缺點。

如所周知，研究當下中國大陸經濟現實的最大障礙，是缺乏有系統的完整數據，而官方所公布的統計數字，除一九五二至五七這一段較有系統外，非但零星殘缺，而且常常先後矛盾，互有出入。至於無可查證一節，則早已被公認為不可克服之障礙。本書有

關作者，除極少數外，均不諱言此一障礙，並且在利用官方資料時，取一相當審慎的合理保留，艾約翰甚至坦然承認，其分析所本的官方人口統計資料，「實際上用以證明黨的政策成功者多，用以查核其得失者少。」（In actual practice statistical data were more often used to prove the success of party policies than to test their validity. pp. 85-86）艾氏不只發現，在官方公布的完整人口統計中，絕大部分皆「包含相當多的估計或部分估計數字而非實際查報數字。」（Consist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of estimated or partially estimated instead of reported figures.）而且「其估計方法無不粗陋，有時且基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定。」（The methods of estimating are uniformly crude and sometimes rest on implausible assumptions. p. 118）

屬於黨、政領域的專文，共有十篇之多，以量而言，亦屬不弱，其中外交部分佔五篇，在作為總述的韓登（Harold C. Hinton）《外交政策之演進》（*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之外，另有四文分別檢討共產中國與美國、蘇聯、日本以及第三世界的外交關係。如再算上丘宏達博士的《國際法的概念與實踐》（*Concept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討論其對外關係的文字，已佔半數以上。反觀有關黨與政權之專文只得三篇，不能不令人有重外輕內之感，雖然林賽（Michael Lindsay）教授的《黨史與黨義》（*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Doctrines*）長達七十餘頁。加之入選欠當，與經濟部門的質量相比，黨政一欄顯得相當薄弱。《黨之結構、黨員與羣眾組織》（*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ucture, Membership, and Mass Organization*）一文，對於一九四五、一九五六與一九六九年三屆黨章的分析，顯然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初段，別說把握其歷史與現實意義，觸及其核心的實質問題，甚至連「民主集中制」在各個歷史脈絡中的運作界說，亦未弄清。作者目光所注的，泰半是次要的、邊緣的或枝節的問題。

以抗戰期中與八路軍共甘苦多年的林賽教授寫《黨史與黨義》，自屬上選。在本文中，作者雖未能對中共的意識形態系統作詳盡介紹，然對有關名著的批評頗為精到。例如，在涉及樹爾門（Franz Schurmann）的成名作《共產中國的意理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時，林賽教授指出，「是書之弱點在試圖就中共之觀點陳述其意理系統，因而不克分辨箇中之真偽。」（Its weakness is that it tries to present the ideolog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mselves see it and therefore fail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rue and false parts of the doctrine. p. 196）。對於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的《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一書，他的評語是主題「忽視共產國際亞歐策略之別。」（His main thesis ignores the



difference in Comintern strategy for Asia and for the West. p. 196) 美中不足的是，一九四九以後的二十餘年所用筆墨較少，正與史學「詳近畧遠」的原則背道而馳。與黨史所佔的篇幅相較，黨義部分亦嫌份量不足。不然，就應另有一篇專門討論中共意理的文字，填補此一真空。

《統治少數》(The Ruling Elite)一文，似乎頗能掌握中共政權的特質，祇以未作深入解剖與全面闡明，其精要之概括反而貽人以過分簡化之印象。

涉及教育、文學和藝術的三篇專文，各有千秋，俱是成熟之作，《表演、觀賞藝術與音樂》(The Performing and Visual Arts and Musics)一文所顯示的經濟平衡布局，非高手不克臻此。陳世驥的《共產主義下之語言與文學》(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非僅觀析入微，於政治、文學之主奴關係所見尤為真切。本文更透露，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三十五個月中，大陸所印行的毛澤東著述，包括各種文選、語錄在內，竟達三十億冊之多。

不過，最為圓熟而精透的，或許還是陳錫恩教授的《教育》(Education)。本文以點明「教育」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開端。作者指出，在中國大陸，教育一詞的含義，遠比非共世界廣泛，在那裏，「教育被認為與說服同義」，而「教訓與宣傳同是說服的形式，因而與教育不可分離。對人民心思有影響的任何事物皆擔當教育任務。因此，並無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之分。」「所有的教育、訓練與宣傳機關皆集中於追求相同的一般目標與當下目的。博物館、劇院、說書人、電影院、報紙、小說、戲劇、和各種文學藝術作品，以及遊行、示威和各種運動，皆是為了服務同樣的宗旨而策劃。」(Educ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synonymous with persuasion... Indoctrination and propaganda are forms of persuasion and are inseparable from education. Whatever makes an impact 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people performs an educational task. There is, therefor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education and informal education... All agencies of education, indoctrination, and propaganda are centrally directed to pursue the same general goals and the same immediate objectives. The museum, the theatre, the storyteller, the cinema, the newspapers, the novel, the play, and all products of art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parades, demonstrations, and mass campaigns of all sorts, are all designed to serve the same purposes. p. 691)

明乎此，讀者就不難了解中共當局在「教育」上的種種光怪陸離措施。然萬變不離其宗，其具體措施，無論在校內校外，總是基於政治、生產和黨的控制 (politics, production and party control) 這「三條繩索」的束縛。作者以三個 P 字來作象徵化的概括，

於眼光透闢之外，更見其心思機巧。對於學校教育制度之介紹，亦能本末兼顧，唯一的遺憾是作者所用材料以五十年代為主體，對文革以後的演變，只以素描式手法輕輕帶過。

他如丘宏達之《國際法的概念與實踐》，和 William Liu 的《社會階層、少數民族與家庭》(Chinese Society: Stratification, Minorities, and the Family)，都是不可多得的佳構，言簡義賅，平實周到，初入門者最為受用。越飛 (Ellis Joffe) 的《人民解放軍》(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文，亦提供了頗饒興味的資料。

此外，必須一提的，是馬大任所寫的《資料來源簡述》(Sources of Information: A Brief Survey)。馬教授先後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東亞圖書館，並主持收藏現代中國資料最豐富之胡佛研究院之東亞館有年，在中國研究圈中，享有「活目錄」之譽。故而，此文寫來輕鬆灑脫，初學者得此一篇，自可按圖索驥，逐步作深入之探求，可惜此文是為英語讀者而寫，故所列資料目錄亦以英語出版物為主。

以一本通書而載入目錄學專文，足見此手冊不同於一般手冊，而編者心目中的「普通」讀者實在並不「普通」。

許冠三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y Cao Xueqin.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December 1973. (Volume 1: "The Golden Days.")

(一)

《石頭記》(《紅樓夢》)的翻譯，可追溯於一八六八年英人鮑拉 (E. C. Bowra) 在《中國雜誌》(The China Magazine) 所翻譯的《紅樓夢》(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¹ 但祇譯了前八回而已。一八九一年，左理 (H. B. Joly) 譯了五十六回，印成單行本，初在香港出版，其後又在澳門印行。² 這些祇有片段的翻譯，實在賺不到讀者的欣賞。到了一九二九年，就有撮要形式的翻譯，使讀者畧知整個故事的內容，這

¹ E. C. Bowra,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hina Magazine*, Christmas Number, Shanghai, 1868, pp. 1, 3, 33, 65, 97, 127. Also vol. for 1869, pp. 1, 3, 65.

² H. B. Joly, *Hung Lou Me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ong Kong, 1892; Macao, 1893).